

# 与书中主人公傅路娃对话

## ——长篇小说《尘光》形成记

■ 泥文

曾几何时，傅路娃说：你写写我吧，我那么多故事，且那么多经历与你相同之处，这说明你我同享一片光照的人，同时被一粒尘埃青昧的人，你不写我，你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你说写作的过程，是关注普通人的、接地气的、揭示人性的、反映生活本质的过程。看来也是虚有其言，就是一个口号、给自己撑面子而已。

这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喋喋不休地叫唤，让我一刻也无法安宁。

2019年，我终于无法忍受了，说傅路娃，你不是国家里穷，朝不保夕，年少就背着父母离家出走，外出务工而已。这有啥嘛？你又不是啥英雄人物，也没为家固作出与众不同的贡献，要写还不是只能写一个小人物，在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经过挣扎和努力，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状态，其他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傅路娃被我的话噎住了，讷讷地说，好像也是，但我的故事表面上看是一个小人物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状态进行打拼，可也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努力和付出了。

这下换到我无法接话了。傅路娃说的我与他很多经历相同，那倒是真实不虛。

记得年少时逃离故乡，睡大街、睡桥洞、睡还没有使用的水下水道泥筒、睡窑洞；见人挤人、人踩人、人打人地

赶乘车船的场景；不顾忌老一辈人说的“人怕进砖厂，牛怕进磨坊”，进了华北平原的一个砖厂；人小体单质薄，拉着板车上千斤的生砖坯进窑洞，向前走一步人向前匍匐一下，向前匍匐一下，双腿不由自主地跪一下，双手在地上撑一下，爬起来又向前走一步；被本地拉砖司机将板车轮胎胎爆，在被老板耳光问候的同时，还得为坏了的轮胎买单；手受伤了，抓一把炉灰一敷就是灵丹妙药；煮饭时用刚给小孩擦完屁股的手做馒头和炒大白菜，如果哪一天突然不是这样还不适应。

傅路娃说，这些你经历过嘛？是啊，我经历过。

可这也只是小人物务工的辛酸啊，估计大多数进城务工的人都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经历吧。

傅路娃白了我一眼，你不觉得这也是付出吗？城市建设离不开这些东西？我无言以对。

后来，傅路娃逃离砖厂，靠自己的努力，成了班班、成了包工头。一次，框架房切割钢筋，他骑上框架梁上，正在切割中，另一端的钢筋突然断了，沉重的横梁砸在他骑坐的梁上，摆动的力度和幅度，差点让他高空坠落。

这经历我有过，在那种环境里，这也正常。

傅路娃眼里慢慢地浮起了点点滴滴。他说知道我的外甥哥飞吗？知道和我青梅竹马的毛橘子吗？知道一路

帮扶我的大哥王福生吗？你不知道吧？你不觉得他们聚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世界吗？

面对傅路娃一连串的“你知道吗”，我无言以对，但我明白，这是形成他整个务工生活的主要角色，那是走进他生命里的角色，也是形成他人生的重要参与者。

傅路娃说，那你说该不该写写，我这算不算为建设付出过心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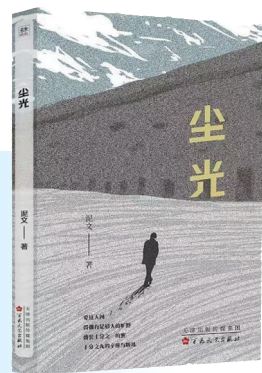
该写该写，以你的故事写进小说，但作为写诗的人，我不会刻意使用诗意的语言去写。你说呢？生活的表现形式就十分丰富，或许诗意就在你行走的过程中自然流露。对于小说人物的形象塑造，我想用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写法，让读者在小说的情节发展过程中自己去勾勒人物，不被“正”或者“邪”的预设局限。实际上，这也是小人物群像的自动生成方式。

可以可以。取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

想到我与傅路娃都是同路人，同在务工这个大环境里挣扎与拼搏；想到前人留有“和其光，同其尘”的句子，何不借用光与尘为题，于是我说，就叫《尘光》吧。

《尘光》经过5年时间的打磨与阵痛而面世时，我心里反倒没有写作过程中的激动和欣喜，淡然的状态，让自己都有点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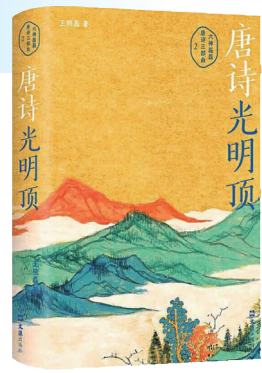
（作者系长篇小说《尘光》作者，《尘光》于2024年10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时节流转，小雪翩然而至，文字的温度却愈发炽热起来。

今天，我们聚焦两位重庆作家的新书。泥文的《尘光》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青年的奋斗与成长；六神磊磊的《唐诗光明顶》则让我们在唐诗的海洋中遨游，感受到大唐盛世的美丽与明亮。两部作品虽题材不同，却都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我们开启了一场别样的阅读之旅。

——编者



说起王晓磊，可能有人觉得陌生，但要说起他的笔名六神磊磊，身边的年轻人几乎无人不知。没错，他就是金庸的“隔代知己”。《唐诗光明顶》是“六神磊磊唐诗三部曲”的第二部，从开元盛世写到安史之乱。这次的“光明顶”寓意最高峰，全书收录了20多篇文章，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北固山下的一艘小船写起，到公元770年杜甫病故的小船收笔，将李白、杜甫、王维等大诗人经历过的高光暗谷，一一写入书中。

读这样的年轻写作人写的书，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首先，引人入胜。六神磊磊读唐诗，不是简单写一篇读后感，而是再现了一个场景，让读者像演情景剧一样置身其

# 让诗意和远方流淌纸上

## ——六神磊磊新书《唐诗光明顶》读后

■ 李立峰

中，与诗人对座，与诗人对谈，给读者以强烈的代入感和现场感。他这种讲故事的风格，深受年轻人的喜欢，既实现了平等的对话，却又不是知识的罗列、单向地灌输。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消解了唐诗中晦涩难懂的词汇和艰深拗口的用典，让读者轻易就能萃取出唐诗的精华与美妙。这种引人入胜的手法，也唯有长期做过新闻记者的人才有此功力拿捏，恐怕连专写小说的作家也未必能篇篇做到。

其次，言之有理。在中国，解读唐诗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作者解读唐诗，做到了出其不意。他站在年轻读者的立场上，站在一无所知的小白的立场上，把一首唐诗背后的故事一网打尽，把一首诗掰开了、揉碎了，细细说给你听，它好在哪儿，与其他同题诗或者同时代的诗相比，有什么新意，

有什么创举。无论是耳熟能详的传世名篇，还是名不见经传的诗歌，他总能旁征博引，言之凿凿，把这个诗人放在时代的大语境下去客观评价，放在中华文化的大历史观中去重新定位。从而形成一家之言，且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读他的书，读者仿佛能清晰地听到，知识大门被推开的吱呀声，脑洞被打开后的訇然声，诗闻被打开后的訇然声，诗闻与美好坠入心湖的哗啦啦声。

第三，平视世界。现代的年轻人，与上一代人的最大不同，就是能够平视世界，活在当下，不念过往，不畏将来。这一点，在六神磊磊的笔下，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无论是对于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仙、诗圣，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都能做到平视与共情，始终从朋友的视角、从平民的视角、从读者的角度，写出新意来。令我特别钦佩的是，他把金庸小说

的故事信手拈来，联系时下语境和网络热词，触类旁通，令人会心一笑，拍案叫好，从中悟出许多新鲜的道理来，在阅读中得到治愈，在阅读中收获心灵的慰藉。他写了很多小人物，观照了诗坛的丰富性，展现了诗歌的多样性，让诗歌从高高的神坛回归到寻常的人间，最是触动人心。诗歌，终究是民间的，大众的，而不是纯精英的，高高在上的。

从《六神磊磊读唐诗》到《唐诗寒武纪》《唐诗光明顶》，他的每一本书，都得到了同行的盛赞和读者的喜爱，成为重庆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必须承认，从记者转型到作家，从新闻界跨到文学界，作者游刃有余，展现了写作者的无穷魅力，也活出了读书人丰盈的状态。

（六神磊磊《唐诗光明顶》于2024年10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 《活着》：苦难铸就的人生之歌

■ 赵贵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璀璨星河之中，作家余华的《活着》犹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以其深邃的思想底蕴、栩栩如生的叙事笔触以及震撼人心的情感波动，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此作以徐福贵的人生轨迹为经，以细腻入微的情感勾勒与真实厚重的历史背景为纬，交织出一幅动荡时代中普通人生活状态的壮丽画卷，以及人性光辉在苦难中熠熠生辉的动人篇章。

《活着》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的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为小说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主人公徐福贵，由高高在上的富家子弟跌落到穷困潦倒的社会底层，他经历了各个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目睹了家庭的破碎、亲人的离世，却始终顽强地活了下来。福贵的人生轨迹，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命运的缩影，也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人的苦难与坚韧的真实写照。

余华在《活着》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福贵如何在命运的捉弄下，一步步学会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每一次呼吸。他失去了一切，却收获了生命的真谛——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这种超越常人的毅力和勇气，让人不禁思考，在面对生活的无常时，我们是否也能像福贵一样，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正如余华所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然而，《活着》并非仅仅是一部关于苦难的小说。在余华的笔下，福贵虽然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与痛苦，但他始终坚守着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他用自

己的坚韧与毅力，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活着。这种对生命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小说所要传达的核心精神。在小说中，福贵的妻子家珍、儿子有庆、女儿凤霞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情感冲击力。他们各自的命运，虽然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却在苦难中展现出了人性的光辉与伟大。

在当下重新审视《活着》，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所揭示的社会问题与人性困境，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福贵的命运，虽然是个个体命运的写照，但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封建思想的残余、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冷漠与自私，都是导致福贵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小说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刻剖析，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更让我们思考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此外，《活着》还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余华以简洁有力的叙述风格、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深刻的思想探讨，创造了一个丰富而真实的文学世界。每一次翻阅，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在人生的旅途中，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光亮与希望。

（作者为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 cqrbdsb@163.com

（来源：《重庆日报》）



【作品简介】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07—2010)《蛙》，是当代作家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

题记：善恶转瞬，是非交错；他人有罪，我也有罪。

# 生命不应迷失于制度与人性之间

■ 单士兵

每个时代都有狂风暴雨，每个生命都有权利尊严，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时代的风在往哪个方向吹。不经意间，总有一些生命会被狂风卷至一个荒凉地带。正如作家莫言所说：“人生之路，天天都在刮风。”

显然，莫言这是在以自然之风隐喻社会之风。最近，莫言这样劝慰年轻人“卷也好，躺也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那些吹倒人生的大风，究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莫言的小说《蛙》，就提供了一份极好的分析样本。

2011年，莫言凭借《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蛙》作为代表作被隆重推荐。诺贝尔奖的颁奖词这样说：“莫言的小说，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在人的批判中寻找和发现生命的真实，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和坚定信念。”不难看出，莫言作品体现的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让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拥有了一片独特的光亮天地。

莫言是唯一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文化荣誉。获得诺奖以后，莫言得到了赞誉，但质疑和谩骂也如同狂风席卷。对此，莫言这样形容：“虽然不是龙卷风，也是8级以上的台风了。”当然，莫言的价值观是笃定的，对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以及广大人民的深情爱意，是毫不动摇的。所以，他为自己总结八个字，叫“心若巨石，八风不动”。

大风吹来，能够岿然不动，说到底，还是价值观在支撑。莫言既是文学创作的牵线者，也是文明遭受侵袭时的挡风者；中国文学拥有莫言这样的探索者是幸运的，社会上出现谩骂攻击莫言的反智者是可悲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莫言就一直站在文学的“风口浪尖”上，每隔一段时间，他总能拿出一部轰动文坛的代表作，在技惊四座的同时，也总会引发争议。比如，《红高粱家族》《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等，每一部都在引领文学风潮，每一部也都让他站在舆论风口。《蛙》这部作品，带来的风更急，浪更大。

不得不遗憾地说，对作家的定义和作品的评判，很多时候已经严重偏离文学艺术的轨道，掉进了民粹主义的陷阱。莫言就是这样的受害者。

作家余华曾说：“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莫言起码可以拿十次茅盾文学奖了。”如此说法，乍听起来似乎有点浮夸，但真正研读过莫言作品，真正读过现有的53部茅奖作品，又会觉得余华的价值判断也不失理性。事实上，茅奖作品中不乏平庸之作，而莫言作品整体质量确实体现了较高的水准。原因很简单——莫言一直在创新。

莫言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打底，从西方和拉美的文学潮流和表达技术中汲取养分，把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印象派等艺术表现手法与中国叙事进行融合。莫言在小说文本、结构、思想上进行的各种创新实验，也一次次得到了回报。《蛙》这部作品从选题到结构，从文本到思想，都展现了莫言不断突破自我的能力。

单凭这部小说的题材，就足以令很多作者望而却步，因为这部小说内容聚焦于中国人的生育问题，集中描写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人性惨剧。小说叙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包括十年动荡年代在内的很多历史重要时刻，都有细节场景还原。《蛙》不仅有复杂的历史记忆，还有强烈的题材批判，以及深刻的反思忏悔。驾驭这样的题材，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

相较于《白鹿原》全景式历史描写，《蛙》更加聚焦于某个具体领域，不及《白鹿原》的中正厚重。包括莫言自己也说过，《蛙》的整体篇幅显得相对单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蛙》能如此勇敢切入生育领域，所释放出的艺术价值内涵和社会批判精神，就是无法复制和替代的。

作家的所有尊严都应该来自作品，作品的价值只能依赖于创新。《蛙》在结构上堪称匠心独运。这部小说前四部分采用书信体，引出小说叙事，最后部分以话剧形式收尾，在书信、小说、话剧三种文体中自由切换，形成互文关系，构建起一个有机的整体，给这部作品增添了文化高级感。

这样极具独创性的结构，铺展了从乡村到都市、从国内到国际的广阔叙事空间，便于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最后，小说又以话剧形式与前面内容形成互文，进行完善补充，以强烈的画面感和触及灵魂的对话，有力地唤醒了人们对人性和伦理的深度反思。

21世纪以来，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讨论空间不断得到拓展，这为莫言写作《蛙》提供了环境支持，而《蛙》的面世和获奖，又为相关制

度反思延展了空间。毕竟，这部小说出版于2009年，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都到2016年了，这段时间正是《蛙》不断获奖并且引发热议的高潮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莫言小说对文化表达空间带来了扩展的价值。

生育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和权利，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保证，人口问题关系到家庭伦理，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莫言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客观存在过的历史真实，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化责任。

叙事主体“我”的姑姑曾被人们称为“活菩萨”“送子娘娘”，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极有天赋的妇产科医生成功接生过上千名的新生儿，展现了善良、真诚、正直的品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人口急剧增长的压力，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女人上环、男人结扎等措施手段遭到民间抵制，让政策收效甚微；上世纪80年代，随着这项政策从严收紧，姑姑也成为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带领计生“小分队”对违反政策、计划外超生的孕妇围追堵截，在诸如“喝毒药不吞瓶，想上吊给根绳”等粗暴残忍的“土政策”驱动下，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活阎王”“女魔头”。

莫言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情节的跌宕，矛盾的冲突，场面的渲染，让这部小说有着强大的冲击力。姑姑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如同一位无比残忍而又充满智慧的战场指挥官，对孕妇搜捕和追逐的场面，紧张到令人窒息。

比如，姑姑坐在船上，看着危水逃走的张琴老婆在水中沉浮，像是在玩着一场猫鼠游戏，不料，孕妇因心脏病突发惨死水中；为了把“我”的老婆王仁美从藏身之处逼出来，姑姑采取“连坐”方式，用大型机器器毁损邻居的树木和房屋，最终，王仁美只能接受引产，惨死于手术台；陈勇的妻子王胆乘坐筏子逃跑，姑姑开着机动船在后面追捕，随后，王胆急于在筏子完成生产，孩子虽然活下来了，母亲却含恨而亡……

当时姑姑总是显得觉悟很高，一脸正义，摆出一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姿态，被她亲手毁掉的孩子就有两千八百多个。面对制度，基于人性，她本应有“一厘米的自主权”，让更多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发出第一声“哇”的哭声。

姑姑退休那天，正值农历七月十五，是民间风俗中的鬼节。那一晚，姑姑喝完酒回家路上，周遭全是凄惨的蛙鸣，像是“无数受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大大小小各色鼓着眼睛的青蛙，从洼地中，从芦苇丛中，跳到姑姑身上、背上、耳朵上，成群结队地对她进行追逐、拦截、袭击，这种似梦似真的场景令姑姑无比恐惧与痛苦。由此，姑姑忏悔意识被唤醒，赎罪也成了余生最重要的事。

忏悔和赎罪是要有仪式的。后来，姑姑拼命地通过记忆复原那些婴儿该有的面貌，让民间艺术家大手来捏成泥娃娃，然后给泥娃娃上供、烧香。在姑姑看来，“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回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死去。”

值得强调的是，莫言并没有把造成历史悲剧的原因简单归咎于政策制度或某个群体，而是构建起一个“他人有罪，我也有罪”的救赎闭环。小说不加掩饰地写出“我”的欲望性、功利性和虚伪性，毫不回避地指出“我在妻子王仁美之死中应负的责任。正如莫言所说：“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刽子手，每个人也都有可能成为罪人。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认识到自己的多面性，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谅解和宽容。”

“蛙”，就是这部小说的中心意象。莫言也借“我”之口进行了这样的阐释：“（剧本）暂名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娃的‘嫫’。女娃造人，蛙是多子的象……”显然，“蛙”，就是“娃”的隐喻，在指向孩子，指向生命。生育关系到人性和伦理，关系到人的权利和尊严。孩子就是一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对无数缺乏信仰的人们来说，把孩子作为信仰，或许才能进入精神危机的解救之途。

从“听取蛙声一片”的庄稼丰收传统美景，到“听取蛙声一片”普通家庭幸福场景，人们对自然与生命只有充满敬畏，才能拥有美好生活。遗憾的是，人定胜天的狂妄造成太多破坏自然的悲剧，而在制度和人性之间，也总有入陷于迷失，被时代的狂风轻易裹挟，或是迷途难返，或是靠忏悔和赎罪来找回心灵的宁静。